

# 缅怀我的科研引路人 吴先生

黎兴江

(1932~)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研究员。

吴征镒先生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当所长（1950~1958年，北京植物所副所长；1958~1984年，昆明植物所所长；1984年以后，直至2013年逝世，他都是昆明植物所的名誉所长）。所以，不少人尊称他“吴所长”。熟悉他的人，戏称他“吴老当”。我从1954年至今，一直称他“吴先生”，从未改口。因为，吴先生不仅是我的领导，他还是我从事科研业务的引路人。吴先生引领了我的一生。吴先生2013年以九十七岁高龄离世。“逝者为大，逝者为尊”，现在我应该尊称他“吴老”了。

几十年来，吴先生不仅是我的领导和启蒙老师，他更是我的、我们昆明植物所的、中国植物学界的最大靠山。我们不能没有他。但是，他终于永远离我们而去了。他给我们留下的，是万分的悲痛，深深的遗憾。

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，是1954年，吴先生说服我搞植物分类学，引领并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。

六十年前，1954年的夏天，我从四川大学生物系（植物学专业）毕业，由国家统一分配，我到北京（中科院）报到，院干部局把我分配到北京植物所工作。

1954年9月初，我去北京植物所报到时，是吴先生接待我（那时，他是北京植物所的副所长，分管人事）。他说，所里决定让我到植物分类研究室工作，具体是跟随秦仁昌先生搞蕨类植物分类。但当时秦先生还在昆明，正在办理调往北京植物所的手续；所里就让我先跟分类室主任汪发瓚先生学习。

当时我提出，希望能分配到细胞研究室，跟吴素萱先生学习细胞遗传学。吴素萱先生也向所里提出了要我去跟她的要求。

但吴所长不同意。他对我说：

“分类室需要年轻人。你是川大生物系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教授的学生，你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川西地区豆科植物分类；所以，我才让你到分类室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喜欢枯燥、无用的植物分类学。”

他问我：“你喜欢植物吗？”

我答：“非常喜欢，所以才选读植物学专业。”

他说：“像人一样，假若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姓名、家族、性格、特



2008年1月与吴先生亲切交谈



点，你怎么能够说喜欢他？植物也一样。你首先得知其名，知道它的系统、亲缘，知道它的生态习性、形态特征、地理分布，你才能说喜欢它、利用它。所以，你必须先学好植物分类学。”

我感到他说得很有道理，就去了分类室。这是吴先生为我人生作出的第一次选择。是他引领我跨进了植物分类学殿堂；这也决定了我的一生。这一走，就走了六十多年。

我在北京植物所待了几个月，适逢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、“中国苔藓学之父”陈邦杰教授举办苔藓研究班。因北京植物所高等植物分类中尚缺苔藓这门学科，陈先生也给北京植物所所长钱崇澍教授发函，邀请北京植物所派一人前往南京师院参加苔藓研究班学习。钱所长和吴先生商量后，决定派我去南京。我这一去，就是四年。这四年，我都是跟随陈先生学习和研究苔藓分类。

我第二次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，是1978年吴先生支持我白手起家，在云南坚持搞苔藓分类。

那一年，“文革”已结束了一年多，吴先生早已被“解放”，并复任昆明植物所所长；作为“科学的春天”的重要标志，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。但是，十年“文革”给科研事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，日益显现。业务生疏，资料文献散失，人才流失，……真是千疮百孔，百废待兴。

那一年，我向吴先生提出：我虽是1965年底调来昆明，但几个月后就爆发“文革”，科研业务被迫中断；十年之后重新开始，早年的苔藓标本、图书资料均留在北京，我在昆明无法开展苔藓植物分类工作。

吴先生经过考虑，就给北京植物所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。信中说：“文革”期间，中国唯一的苔藓学家陈邦杰先生已经去世；黎兴江是陈先生的大弟子。我们既然派她跟陈先生学了苔藓分类，就应该为她创造条件，让她继续搞苔藓分类。

吴先生建议：（1）目前全国搞苔藓的，仅有陈先生的几个弟子；他们各自的标本、图书、资料均不多。最好将其人和物全部集中到北京，由北京植物所领导，接手陈邦杰先生开展的《中国苔藓植物志》编写工作。（2）若北京植物所不同意上述方案，则可将北京、东北各所的人员、资料调到昆明，昆明植物所愿组织领导此一工作，集中力量继续开展中国苔藓植物分类工作。

不料，此两条拯救中国苔藓分类的措施，均遭到北京植物所拒绝。他们自认为他们的人最多，标本和资料也最多，不同意合并。

为此，我又向吴先生提出：我手边既无标本，又无资料，根本无法开展苔藓分类工作；我愿意跟随吴先生搞种子植物，具体做云南豆科植物分类。

但吴先生坚决反对。他说：“我们种子植物分类、《云南植物志》的编写工作，确实缺人；但我去向任何大学要几个植物专业的毕业生，来培养几个月，就可以协助我们工作。苔藓分类不一样，既要观察它的生态习性、形态特征，更要研究微观的细胞结构；苔藓标本要切片，要用显微镜、电子显微镜来进行细胞分类，绝不是一下子就能上手的。陈先生已经去世，你们几个弟子不能再改行，否则过些年，就只有派人再到国外去学习苔藓分类了！你必须坚持，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。标本没有，自己动手采；年年采集，随时注意搜集，像滚雪球一样，日积月累，多年以后一定能开展工作。”

与此同时，他还告诉昆明植物所图书馆的施培基馆长：“苔藓、真菌，是我们所的新建学科，没有图书、杂志。配给我们所的外汇指标虽然不多，也要尽量首先满足他们的需要，让他们有条件向国外买图书、订杂志。”

在吴先生的特殊支持下，不到十年，我们就搜集到十万号以上的孢子植物标本，购进了全世界



与本专业有关的主要图书杂志。我们在苔藓、真菌方面的研究条件，似乎已与北京所、东北所不相上下了；我们完全有条件自力更生做研究，写论文，编研《西藏苔藓植物志》《云南植物志（苔藓卷）》和《中国苔藓植物志》了。

我第三次转折点，是吴先生1980年设法派我到芬兰进修，看中国苔藓模式标本。

芬兰是全世界的苔藓研究中心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柯普南教授（Prof. T. Koponen）是世界级的苔藓学权威，国际苔藓学会主席。芬兰搜集了全世界最多的苔藓模式标本。我们要想编研中国苔藓志、云南苔藓志，都不得不去芬兰，都必须去芬兰，查证中国的苔藓模式标本。

当时我国科技人员出国，有两条渠道：外事口（出国逗留时间短，但易于批准），教育口（出国逗留时间相对较长，但不容易批，要耐心等待）。我们课题组申请派我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看中国苔藓模式标本，把这个出国项目报到所里，经分院汇总，上报到院教育局。但是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也不见批下来。经过询问，才知道中科院教育局根本就没有派往芬兰的指标；要去芬兰，就必须找国家教育部。

吴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就利用他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学部主席团会议的机会，找到教育部的一位主要领导。问题得到顺利解决，我利用教育部派遣到芬兰的出国指标，获准去芬兰。教育部安排我1981年春季出国。

此次我在芬兰，整整呆了一年；工作日全都是在赫尔辛基大学标本馆看中国苔藓模式标本。

芬兰全国除了森林，就是湖泊，基本没有农田，吃的东西全靠进口；因此，生活费用特高。教育部给我的生活费，是每月700芬兰马克。柯普南教授见我生活十分窘迫，就向芬兰科学院帮我申请了副教授级资助，我的生活费一下子就升到每月2600芬兰马克。我通过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处，退掉了教育部给我的生活费。当时在芬兰，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只有七人（我搞苔藓，其余六人搞低温物理）；我甚至有条件周末请那六个年轻人来我住处“打牙祭”了。

吴先生把我送到芬兰进修，使我有机会见识苔藓学研究的国际最高水平，有了奋斗和追赶的目标，真是获益匪浅。我以后能在苔藓学界占有一席之地，能主持编出《西藏苔藓志》，能使苔藓植物在《中国孢子植物志》和《云南植物志》中占据一定的篇幅，能在昆明植物所参与创建隐花植物标本馆，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《隐花植物科属词典》，所有这一切，大部分源于我在芬兰进修一年所获得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积累。

吴老是我真正的人生导师。如今，他虽已驾鹤西去，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和学术财富，伟业永存，恩重如山。我真心地感谢吴老，怀念吴老！

